

2008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

杉 牧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

总论 陈支平重新评价了明代后期的社会经济变迁,认为固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下,这场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未能成功,但它已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而“容纳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相成”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尤其长远意义。

戴逸用“驼峰型模式”、循环上升概括了清代300年的经济发展,指出即使在经济发展最高峰时期,中国经济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经济总量不少,但不可持续。19世纪的低谷既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社会结构问题,但此时的经济领域中产生了新的因素,中国社会由此发生着重大变化。方行分前后两期分析了清代经济大势,强调清代前期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并指出长距离贩运贸易和突破区域性限制的大市场和运输条件,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全面走向成熟的表现;而清代后期,中国既有社会沉沦,又因为可以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发展经济,从而具有社会进步。魏金玉在2003年之后,进一步归纳了清代前期经济特点:针对明清进入中国封建经济发展下行阶段的观点,提出清代经济的宏观趋势,是不断发展、持续发展;针对过密化经营是农民贫困化根源的看法,指出以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恰是明清小农家庭所能采取的最合理的经济结构。高王凌指出最近十几年中,清代经济史研究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定性、经济交流的作用、经济发展中的工业生产、农业政策研究等领域,均有建树。

于秋华沿着诺斯把国家置于“悖论”状态的思路,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解释并分析重本抑末的产业政策、闭关自守的外贸政策和杂征苛敛的财税政策等政府政策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吴翔、姚星认为经济恢复政策、赋役改革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禁榷制度、矿冶管辖、海禁政策则压制和摧残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庞明进在分析影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因素时,加上了重征商税一项。

土地制度与经济形态 黄华兵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结合丰富的史料,认为“活卖”与“找价”现象在明清之际兴起的原因在于活卖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司法官员在诉讼中所持有的普遍情理原则也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而同样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活卖与找价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而走向滑稽和不合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档案馆收集、编辑的《清河州契文汇编》收集了588件清朝河州地方契文,武沐、王敬伟以此为切入点,对清代河州土地交易情况进行研究,考察了土地价格、土地交易量,分析了土地买卖中反映的经济社会关系及回族经济状况。^⑩

胡启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的永佃制。传统租佃制的制度困境,即佃农“佃权”无法保障,导致佃农、地主乃至国家利益受损,致使永佃制作为一种自发的内生制度创新而出现。随着人口增长、定额地租等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永佃制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安排,而这正是农村封建土地关系分解的表现。^⑪李文军、王茂盛将明清时期的“一田两主”与永佃关系相联系,分析了“一田两主”的产生途径、法律特征、社会影响及其改造,特别指出,近代民法典

陈支平:《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戴逸:《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方行:《对清代经济的一些看法》,《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魏金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的补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高王凌:《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史林》2008年第4期。

于秋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落伍的政策因素解析》,《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吴翔、姚星:《明清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时代经贸》2008年6月中旬刊。

庞明进:《浅谈明清法律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年第34期。

黄华兵:《明清时期土地活卖与找价现象初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年第8期。

^⑩ 武沐、王敬伟:《清代河州契文中的土地买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⑪ 胡启扬:《清代永佃制盛行的制度分析》,《安徽文学》2008年第10期;《探析清代一田二主式租佃制出现原因——以永佃制制度的内在变迁为分析中心》,《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2期。

中的永佃权与在明清时期就广泛存在的“永佃关系”是不同的。清代江南官学主要采用了出租学田收取租息的经营方式,张小坡对学田的地租形态、地租额以及租佃关系等问题予以关注。李伯重从大量资料入手,就清代中期江南苏州、松江地区的地租、房租问题(特别是名义地租与实际地租、房租与房价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新的探讨。

贾原从一些喇嘛教大寺庙的财产状况出发,具体分析了寺庙经济收入的来源,并指出寺庙经济的发达是喇嘛教繁荣的重要支柱。寺院土地是清代蒙古地区土地所有制形态的重要类型,也是清代蒙古寺院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胡日查具体考察了清代蒙古寺院牧场、耕地和地铺三种土地的来源、生产经营方式和地租形态。

申浩分析了清代以来江南市镇中的脚夫来源及其发展演化,认为脚夫存在着封建依附性和暴力倾向等问题,虽一无所有,却不能转化为真正的自由劳动,其危害性亦难以克服。

农业 张颖华受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争论的启发,深入探究清代农业经济思想、农业政策对传统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清代农业政策一方面有利于传统社会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又因为追求片面的粮食保障而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制约与束缚。赵国号关注了明清的农民迁业问题,探究了农民迁业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魏小英、曹敏等认为明清时期农业领域的商品经济确有长足发展,在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等方面均有所表现。高志超指出农业的生态性、商品性经营模式,农民的非农业化发展趋势,政府的有意或无意的扶持,均是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商品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⑩袁洪描述了清代前期,在地方官吏积极推动下,昭通农业经济取得的长足进步。^⑪

梁诸英等描述了清代皖南平原的圩田开发形式,探讨了地方官吏在圩堤新筑及修缮中的重要组织与管理作用。^⑫李玉尚等分别考察了湖州、嘉兴、苏州、松江、太仓耕牛数量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认为太平天国战前和战后耕牛情况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造成时空分布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制约。^⑬王洪瑞从粮食总收获量及粮食负担的定量分析,粗略估算出清代河南农民的粮食净收获量,认为土地产出过低而农民负担过高,使得清代河南农民生活贫困。^⑭

吴建新引用丰富资料,详实考证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并初步论述了这些作物对广东作物栽培制度、肥料应用、药物防虫技术的影响。^⑮吴继轩指出,明清时期,在国家鼓励植棉政策的引导和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山东西部,特别是运河沿线地区的植棉业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三大棉花生产区域——东昌、济宁和曹州。^⑯胡长春等就明代茶叶生产及其采制加工的相关问题略作阐述。^⑰杨志玲叙述了明清时期云南茶业经济的发展条件、表现及其障碍,说明随着茶叶产区的扩大、茶叶种类的增加、茶叶生产及制造工艺的进步、交通的局部改善等,云南茶业经济在明清时期跨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⑱闫敏总结了明清时期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的已有研究状况。^⑲

李文军、王茂盛:《论明清以来“一田两主”的地权关系及其改造》,《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张小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租佃关系初探》,《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

李伯重:《清代中期苏松地区的地租与房租》,《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贾原:《论清代喇嘛教寺庙经济收入的来源》,《前沿》2008年第1期。

胡日查:《清代蒙古寺院土地及其经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申浩:《对清代以来江南市镇中脚夫群体的考察》,《史林》2008年第2期。

张颖华:《论清代农业政策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影响》,《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赵国号:《明清农民迁业问题》,《安徽文学》2008年第3期。

魏小英、曹敏:《明清时期农业领域商品经济发展刍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⑩ 高志超:《清代珠江三角洲农业商品化的反思》,《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16期。

^⑪ 袁洪:《清代前期昭通地区农业研究》,《云南档案》2008年第10期。

^⑫ 梁诸英、衣保中:《清代皖南平原圩田发展考略》,《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梁诸英、陈恩虎:《清代皖南圩田的发展及地方官吏的作用》,《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⑬ 李玉尚、赵玮:《明清以来嘉湖地区耕牛的变化——兼论太平天国战争对耕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李玉尚:《明清以来苏松太地区耕牛的时空分布》,《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

^⑭ 王洪瑞:《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⑮ 吴建新:《明清广东主要外来作物的再探索》,《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⑯ 吴继轩:《明清时期山东西部运河沿线地区棉花的种植与发展》,《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⑰ 胡长春、吴旭:《试论明代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

^⑱ 杨志玲:《明清时期云南茶业经济探析》,《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⑲ 闫敏:《明清时期烟草的传入和传播问题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水利 何伟福主要根据《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明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讨论明代天津水利营田尤其是屯田的发展沿革。冯江峰介绍了明清时期陕北水利事业的发展进程,回顾了明清时期陕北农业的发展及其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对自然环境、农业、水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原则。

江淮运河乃沟通南北运河之枢纽,元明清三代政府都极为重视对其整治与管理,吴士勇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王频从自然社会等多方面考察了清代运河的衰落原因:大运河自身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注定了其命运多舛;封建政府治河保漕的根本目的导致了运河治理的失当;河政的腐败使运河走向衰败;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运河体系的崩溃。

肖启荣阐明了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堤防管理制度的变迁以及空间差异,认为堤防管理制度的形成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对水利环境变迁适应的产物,堤防管理制度形成背后,地理环境因素发挥着相当作用。许杨帆选取山西定襄县一条重要引水渠道——广济渠的相关水案为线索,结合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探讨国家与地方社会各种力量在水权控制争夺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认为:宗族力量在华北地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具有实际意义的作用,行政归属不同在地方水利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翟婷等介绍了以堤防和坑田为主的汉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并对其中反映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士绅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以及商人力量的兴起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卞建宁通过对若干碑石资料的解读,考察了清代陕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管理制度的运作、水利纠纷问题的解决等问题。邓静就明清时期湖北水利堤防管理制度中的修防制度(堤甲制、坑长制、保固制度等)、修防经费来源(官帑、民力)以及官督民修与绅衿作用等问题进行探析。

手工业 廖倩将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发展分为四个时期:过渡期、黄金期、“黑暗”至复兴期、竞争期,其间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⑩杨蕾等讨论了明清江南织绣背后的经济生态特点,特别指出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周期性造成了织绣由家庭走向市场的艰难和兴衰波动。^⑪

城镇与商业 廖声丰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江海关档案等资料,分析了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指出清代前期,上海已经是重要的商品流通中心,近代西方把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仅仅是把上海贸易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已,不能把近代上海的崛起完全“归功于西方”。^⑫徐晓望考证了厦门湾3个港口月港、安平、厦门相继崛起的过程。^⑬他还指出明清时代福州的工商业有很大发展,城市扩展很快;福州人以工商为生,养成了重视商业的习俗,勇于海外探险,富有开拓进取精神。^⑭

谢澍利用上海图书馆藏《璜泾赵氏小宗谱》和《璜泾赵氏献征录》两部家谱文献,参以其他史料,以璜泾赵市为个案,在追述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明代粮长、市镇历程以及家族发展联系到一起,探讨了明中期高乡市镇兴起的动力、机制以及发展过程。^⑮祁美琴等通过对清代蒙古城镇中最具特色的商业区——“买卖城”的概念、性质、规模、布局、市场特色、交易方式、商业群体、市镇管理、行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探讨“买卖城”的形成及其商业特色和商业地位,揭示清代蒙古地区城镇建设的状况和商贸活动的特点。^⑯张萍从集市发展、集市数量统计、集市密度三个方面论述了明清时期陕西集市总的发展进程与地域特征,指出,在陕西集市发展进程中,不仅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时段性

何伟福:《〈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冯江峰:《明清时期陕北农田水利关系之分析》,《兰州学刊》2008年第10期。

吴士勇:《略论元明清三代对江淮运河的治理》,《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王频:《清代运河衰落原因论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肖启荣:《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堤防管理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辑。

许杨帆:《明清以降漳沱河水利开发与水利纠纷——以山西省定襄县广济渠水案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8期。

翟婷、胡理:《明清时期汉江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建设与社会关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卞建宁:《碑石所见清代陕州地区的水利问题》,《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邓静:《明清时期湖北水利堤防管理制度初探》,《鸡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⑩ 廖倩:《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发展》,《景德镇高专学报》2008年第4期。

⑪ 杨蕾、刘冬华:《明清江南织绣的经济背景研究》,《装饰》2008年第5期。

⑫ 廖声丰:《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与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⑬ 徐晓望:《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⑭ 徐晓望:《论明清福州城市发展及其重商习俗》,《闽江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⑮ 谢澍:《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⑯ 祁美琴、王丹林:《清代蒙古地区的“买卖城”及其商业特点研究》,《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人文环境因素也是改变区域市场发展轨迹的一个重要力量。王文成、顾胜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省镇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段裕祥将明清时期广西圩镇与江南市镇进行对比,认为广西圩镇此时开始得到初步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缓慢而拙朴的,明显滞后于江南,原因在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山地交通。霍丽娜以明清旧志为主,追述了宁夏集市的概况、管理及其功能。张绪考察了清代皖江流域的市镇市场,指出清代皖江流域的市镇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层级关系,处于不同市场层级中的市镇承担着不同的经济功能;在清代皖江流域的农村交易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商业镇而非集市。在掌握清代前期高县市镇空间分布和类型的基础上,李俊锋分析了高县市镇经济发展的自然和人文因素,认为知县康基渊发展经济的举措、思想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周珺指出清代赣闽粤边区盐粮贸易的频繁,带动了三河坝、兴宁、下坝等赣闽粤边区市镇的发展。刘效云考察了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的类型与特点。

汪崇策对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提出质疑,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萌芽”的概念,并以“明清时期的淮盐经营与徽商”问题为例,对这一概念进行叙述。将明清两淮盐业的兴盛,作为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萌芽的一个典型是合适的。蔡苏龙等立足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对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儒商伦理形成的关系进行考察,指出儒商伦理的形成实际上包括儒士的商业化和商人的儒学化两个过程,它们对明清后期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⑩崔瑾分别探讨了明代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阶层、以文人儒士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以平民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价值观念由“重农抑商”向“工商皆本”的变化。^⑪余龙生将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义利并重的财富伦理、诚信经营的经营伦理、以和为贵的和合伦理、崇俭黜奢的消费伦理、崇奉许逊的信仰伦理等5个方面。^⑫童建军等从现代企业中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出发,思辨地提出,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有助于提升徽商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其经营绩效。^⑬

林枫具体分析了明清福建商帮“犯禁式”的经营观念、“粪土式”的资金出路、“梦寐般”的政治追求等性格弱点,意图探究中国商人未能充分发挥社会变革主力军作用,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演进过程的深刻原因。^⑭成艳萍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晋商驼帮、船帮、票号3种经营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晋商发展轨迹中所体现的商品贸易与票号金融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是一条与欧洲并行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生性发展。^⑮张永汀简略介绍了晋商的家族制度、教育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文化制度,指出晋商制度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有序性和开放性特征,晋商兴与败皆源于此。^⑯王勇红、王勇浩就山西盐商和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原因等方面的异同之处进行比较,指出盐商的衰落和封建官府的榨取密切相关,而茶商的衰败,则是因为在与俄商的竞争中失利。^⑰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民风、教育以及兴起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性,而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两者却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何威即对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进行了比较研究。^⑱宋丽莉等通过对明清潞商兴衰的全程考察,指出地区优势促成了潞商之兴,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变化下的地区

张萍:《明清陕西集市的发展及地域分布特征》,《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王文成、顾胜华:《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省镇研究》,《学术探索》2008年第6期。

段裕祥:《明清广西圩镇发展滞后性初探——兼与繁荣的江南市镇作比较》,《广西地方志》2008年第1期。

霍丽娜:《明清时期的宁夏集市及其发展》,《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张绪:《清代皖江流域的市镇市场》,《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李俊锋:《清代前期高县市镇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分析》,《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周珺:《清代赣闽粤边区盐粮流通与市镇的发展》,《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刘效云:《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类型及特点初探》,《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汪崇策:《一个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萌芽的典型——论明清淮盐经营与徽商》,《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⑩ 蔡苏龙、曹秀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儒商伦理的形成》,《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⑪ 崔瑾:《价值观念转变的背后——略论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演变下的明代商品经济发展》,《沧桑》2008年第3期。

⑫ 余龙生:《浅析明清江西商人商业伦理精神的基本内容》,《江苏商论》2008年第3期。

⑬ 童建军、刘光斌:《论明清徽商的商业道德与现代浙商伦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2期。

⑭ 林枫:《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⑮ 成艳萍:《国际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明清晋商》,《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⑯ 张永汀:《明清时期晋商制度系统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

⑰ 王勇红、王勇浩:《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⑱ 何威:《明清时期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比较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

优势劣化,又造成了潞商之衰。武忠远等剖析了影响明清陕商成功的资金、技术、信息等多方面因素,认为商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陕商成功的关键因素。王裕明、郑小娟均以明代程虚宇兄弟分家为分析基础,前者讨论了明清商人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对商业资本组织形态、商业资本经营方式以及商业经营效益的影响;后者指出尝试性分业和整体上表现为阶段性继业是程虚宇家族在典当资本继承方式上的显著特点。他们都对那种认为分家析产阻止资本积累与发展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范金民描述了清代山西商人在华北和江淮等地以及北京的投资酒曲踩造、从事酒曲贩运、酒类酿造等活动,证明山西商人是从事酒曲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杨俊国等指出:清代以来,晋商开拓了新疆市场,丰富了边疆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加强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在支持中央财政、反对外来侵略、弘扬爱国精神、传播晋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戴天放总结了30年来明清时期江西商品经济的研究成果。项勇对清代热河商业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秦宗财从明清图书市场发展的大背景出发,考察了徽州图书市场及其相联系的坊刻市场,指出徽州坊刻运作具有鲜明的市场特色,主要体现在选题的市场细分、图书装帧的市场竞争以及市场的促销手段等方面。谢永平从徽商的涵义出发,认为徽商成帮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徽商势力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演变在时间上同步。石涛、李志芳力图在一个相对纯的环境内,选择嘉庆年作为时代背景,以晋商贩运茶叶的人数、路线长度、运输工具及数量、两地茶叶价格、银价和粮食价格、榷关税和意外情况作为考察对象,对清代晋商茶叶贸易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得出利润率,从而揭示了晋商远赴他乡,往返于武夷山和恰克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和北路茶叶贸易中自发形成的国际性市场的经济动因。^⑩王璐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地理等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伙伴主要集中于蒙、俄的原因。^⑪黄彩霞指出,作为江南粮食市场的主要经营力量,徽商满足了人民的粮食需要,稳定了江南粮价,促进了江南粮食市场体系的形成。^⑫裴元生从政府盐业政策、人文传统和文化底蕴、市场供需等方面探究清中期扬州书画市场繁荣的原因,指出书画家价值观的改变和职业化的倾向,是扬州书画市场繁荣的重要标志。^⑬以康熙三十年为界,此前,东北一直是农产品的输入地区,此后,东北农产品大量输出。张士尊就其中原因及作用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对粮食输出量进行估计。^⑭

丁玲玲阐述了清代泉台贸易对泉州沿海港口经济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促进沿海港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带动沿海港口居民到台湾经商拓业,推动了泉州造船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沿海港口海关管理机构的设置。^⑮叶真铭指出,闽台经济贸易的日趋兴旺,促进了郊行和郊商的形成,而郊商的出现又有力推动了清代闽台贸易的发展,为繁荣海峡两岸的经贸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⑯

金孝真从明清话本小说中看出的不但有江南的商业经济活动,还有新的商业意识、经营方式及致富原因等。^⑰而王菊芹则透过“三言”“二拍”中塑造的商人形象看到了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⑱蒋朝军

宋丽莉、张正明:《浅谈明清潞商与区域环境的相互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武忠远、张婕:《明清时期陕商成功的影响因素分析》,《商业时代》2008年第4期。

王裕明:《明清商人分家中的分产不分业与商业经营——以明代程虚宇兄弟分家为例》,《学海》2008年第6期;郑小娟:《尝试性分业与阶段性继业——〈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所见典当资本继承方式研究》,《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范金民:《清代山西商人和酒业经营》,《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杨俊国、马世翔:《试论清代新疆晋商》,《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另见杨俊国、杨俊强《清代新疆晋商初探》,《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戴天放:《三十年来江西明清商品经济史研究述评》,《三明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项勇:《清代热河地区的商业发展初探》,《新学术》2008年第1期。

秦宗财:《明清传统图书市场发展及徽州坊刻市场特色研究》,《商业时代》2008年第33期。

谢永平:《明清徽商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⑩ 石涛、李志芳:《清代晋商茶叶贸易定量分析——以嘉庆朝为例》,《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⑪ 王璐:《明清晋商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原因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⑫ 黄彩霞:《明清徽商与江南粮食市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⑬ 裴元生:《清代中期扬州书画市场繁荣原因初探》,《美术大观》2008年第11期。

⑭ 张士尊:《清代嘉庆之前东北农产品的输入与输出》,《商业研究》2008年第4期。

⑮ 丁玲玲:《清代泉台贸易对泉州沿海港口的影响》,《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专辑。

⑯ 叶真铭:《郊商与清代闽台贸易》,《炎黄纵横》2008年第10期。

⑰ 金孝真:《从明清话本小说考察江南的商业活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⑱ 王菊芹:《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从几部具有典型性的清代小说中撷取一些情节,据以反映扬州盐商的经营方法、经营状况以及艰难的生存状态。

李晓琴等重新探讨了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原因:商品经济大发展和官府对市场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商人会馆产生的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对商人及其职业的认可为商人会馆产生的政治舆论基础,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归属感的需要是会馆产生的地理文化基础。乔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明清工商会馆产生的原因,包括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结果、保护市场秩序的需要、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的需要。宋伦等认为工商会馆在信息搜寻、谈判费用以及交易费用等方面都对降低客商商人市场交易成本起了积极作用,而会费部分取代市场交易成本正是市场交易成本内卷化的体现。宋伦等还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认为明清甘肃山陕会馆的兴衰变迁真切反映了山陕商帮在甘肃力量的消长变化,其分布状况亦反映了明清时期甘肃各地商品经济的时空延展。王云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黄挺则考察了潮州闽西商人围绕汀龙会馆进行的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

林红状对明清及近代牙行的研究成果分时段进行了梳理,并纵向考察了清代前期牙行制度的动态演变及实施过程。周中云等将明代牙行的法律调整分为禁止和规范两个阶段,认为主要法律制度体现在牙行的禁止条款、牙行登记资格、牙行经营范围、牙行管理办法、对违法牙行的惩处条款等方面。^⑩商牙纠纷是明清商业纠纷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东海通过查阅明清工商业碑刻集、司法档案以及商会档案,分析明清商牙纠纷的类型,探寻纠纷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强调牙人职能的逐渐公法化,以及由此实施的商业社会控制。^⑪张渝以18、19世纪重庆府巴县衙门保存的司法档案与契约文书为主要史料,检视清代对牙行的管理、控制及牙行实际运作中的规则。^⑫

邱仲麟应用丰富史料,对明代药材生产、市场变化、药材价格,以及社会上施药善举等问题进行讨论。^⑬刘燕通过对清代汉口粮食贸易路线、数量、价格等的分析,总结了这一时期汉口粮食贸易的特点及影响。^⑭李军等通过对清代山西自然灾害与粮价波动相关度的分析,指出二者呈显著相关,但由于清代运行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及晋商的作用等抑制因素的存在,这种相关又是微弱的,偏向低度相关。^⑮蒋慧芳考察了清代前期湖南米谷价格的时空变化,认为米谷贩运活动包括了少量的地方性运销和大规模的区域贸易流通。^⑯

张邦建归纳了明代中后期消费的特点:消费由俭约趋向奢靡;上层社会显示较强的消费导向;不同地区、阶层的消费有明显差异性;社会消费观出现若干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崇俭黜奢的消费观受到冲击。^⑰陈艳君分类描述了明清时期的徽商消费生活,刻画了徽商消费行为诸种特征,并剖析了徽商消费的积极、消极影响。^⑱王鸿泰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诠释了明清城市中茶馆的发展,认为茶馆之类空间消费的日渐频繁,是城市中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又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⑲陶德臣则主要从茶馆地域分布、社会功能、经营方式、社会影响诸方面来考察清代民国时期茶

蒋朝军:《从清代小说看扬州盐商的经营状况和盐业政策》,《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第3期。

乔丽:《再论明清工商会馆产生的原因——以山陕会馆为例》,《科教文汇》2008年1月中旬刊。

宋伦、王有红:《论明清工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中的作用》,《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

宋伦、田兵权:《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黄挺:《会馆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以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人为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林红状:《明清及近代牙行研究综述》,《历史教学》2008年第24期。

林红状:《清代前期牙行制度的演变》,《兰州学刊》2008年第9期。

⑩ 周中云、曹君乾:《明代牙行法律制度考评》,《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⑪ 黄东海:《明清商牙纠纷与商业社会控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⑫ 张渝:《清代乾嘉道年间重庆牙行的管理与运作》,《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⑬ 邱仲麟:《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

⑭ 刘燕:《清代汉口粮食贸易初探》,《现代企业教育》2008年8月下期。

⑮ 李军等:《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2期。

⑯ 蒋慧芳:《清代前期湖南米谷价格初探》,《粮食科技与经济》2008年第3期。

⑰ 张邦建:《明代中后期消费的特点及消费观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⑱ 陈艳君:《明清徽商消费生活述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明清徽商消费行为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⑲ 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茶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馆业的经营状况。朱君介绍了自唐宋以迄于民国时期的成都夜市,指出夜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次拓展了商业,使市民生活充满了生机,并产生了独特的夜市文化。

陈支平选取祖籍泉州府晋江县沿海“闽台商人”(即福建商帮中专门往返于福建沿海与台湾之间的商人队伍)的数宗商事纠纷与诉讼案例,分析了官府、乡族以及商人在商事纠纷与诉讼中的基本概貌,对乡族习惯法的作用予以积极评价。梁仁志分析了明清徽商的捐纳原因、捐纳特点,指出捐纳之风对徽商势力、徽商经营乃至社会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阮莉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时期运城盐商对当地社会在人口、经济、慈善事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朱晓炜分析了明清扬州徽商园林的类型及扬州徽商园林的用途,认为扬州园林的繁盛及南秀北雄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徽商对园林及城市建设的热衷与贡献。周琍选取丰顺盐商张如白父子与张氏宗族、惠阳盐商叶文昭与叶氏家族、松口镇盐商与其家族等典型个案,集中展现广东盐商对地方宗族的参与建设情况,从而揭示了盐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交通 张艳芳大量使用方志资料,从明代渡口的管理机构、渡口设施的修建、渡口的运作、相关的法令法规等几个方面对明代官渡、私渡及义渡进行论列。

财政赋役 张殿清等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具体考察了16世纪中国的财政供养率及其发生原因,并与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英国都铎王朝进行比较,认为明代过高的财政供养率影响了社会有效资本的积累,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阻碍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周逸纾认为政策执行力不足以及统治者不加约束的挥霍与明代中后期财政困境大有关系,并直接导致王朝衰落。^⑩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高寿仙以朝廷物料买办为中心,考述了明代的按月时估、会估制度,并对会估制度的合理性及存在问题深入探析。^⑪岁有生梳理了清顺康、雍正、乾嘉时期地方经费从体制外收入、制度化的地方经费、到最后再度失控的发展历程,并将雍正皇帝的耗羨归公作为清代地方财政形成的标志。^⑫清代早中期在治河工程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饶明奇着重探讨了康熙至道光朝从预算到验收各环节的河工经费管理制度、管理成效等问题。^⑬

廖云德等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辨正史料,考察了明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3府重赋成因,认为元末陈友谅的加征、朱元璋对江西士人的压制导致重赋。^⑭廖声丰、孟伟讨论了清代榷关重建与发展的历史前提和契机,及其分布与财政意义,指出清代榷关是明代钞关的继承和发展,数量更多,分布更广且更合理。^⑮徐斌以湖广地区为中心,探讨了明代河泊所建废的具体原因,以及河泊所建立之前、被废之后,包括河泊所对渔户的管理。指出,渔户管理实际上就是鱼课管理,河泊所的建立直至被废除的过程,反映出明代南方地区的开发不断深入。^⑯

马俊亚从集团利益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明清时期漕粮运输长期弃海运、行河运的原因,认为从经济成本和运输安全方面来考虑,河运远较海运浪费和危险,明清政府的选择是因为漕运的话语权始终为利益集团所控制,专行河运事实上维持了漕、河等利益集团的私利,并造就了许多特权阶层,他们肆意违犯法制,加剧了社会冲突,破坏了社会的和

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的茶馆》,《农业考古》2008年第5期。

朱君:《清代成都夜市刍议》,《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陈支平:《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梁仁志:《明清徽商捐纳之风及其原因和影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阮莉:《明清时期运城盐商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沧桑》2008年第5期。

朱晓炜:《浅谈明清徽商对扬州园林的影响》,《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周琍:《清代广东盐商与宗族社会》,《历史教学》2008年第18期。

张艳芳:《明代渡口述略》,《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3期。

张殿清、王月亮:《社会转型视野下的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率研究——兼与英国都铎王朝比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⑩ 周逸纾:《从财政视角看明王朝的覆灭》,《消费导刊》2008年第19期。

⑪ 高寿仙:《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⑫ 岁有生:《论清朝前期的地方经费》,《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⑬ 饶明奇:《论清代河工经费的管理》,《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⑭ 廖云德等:《明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重赋成因考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⑮ 廖声丰、孟伟:《试论清代榷关的重建与发展》,《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⑯ 徐斌:《明代河泊所的变迁与渔户管理——以湖广地区为中心》,《江汉论坛》2008年第12期。

谐。李想讨论了造成漕军普遍借债的原因与危害及明政府的对策,指出明中叶后漕军积债问题日益突出,明政府缺乏有效补救措施,终至漕军困苦、漕政败坏。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管理 陶德臣描述了元明时期茶引由制度、边销制度、外销制度这三种不同管理体制下的茶叶市场管理机构及其管理职能、管理人员、管理特点。涂小雨等从经济监察这一角度出发,对明政府在农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进行分析,并着重介绍了明代农业经济监察的机构设置、监察内容、监察特点。刘高勇讨论了清代国家通过官牙对民间以田宅买卖为主要内容的不动产买卖契约实施干预,从而保证不动产买卖契税征收的各种手段和措施。张博考察了清政府对东北沿海豆货贸易相关制度,包括税收政策、豆货出口流向的政策性规定、海运制度等的调整,指出清政府调整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东北区域经济发展,而这种制度调整,实际上为东北商品流通贸易格局的变迁奠定了基础。牛海桢注意到了清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对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与民间商人所从事的各民族之间的直接民间经济交往的贸易,所采取的不同政策。

宿小妹、李三谋指出,明代山西饷银制——农业货币税的推行,是以北部边地戍防或武装活动为动因,以塞上粮食生产为基础,以边贸行为或商业供应为杠杆的。商人、政府(包括军方)、农民三者共同完成了田赋改革。李三谋等考察了明代九边军屯、军牧的利弊兴衰,指出军屯与军牧相为表里,使九边兵、农、牧三者有机配合,带动了长城沿线的农牧业经济,有效地支持了边疆的军事活动,并改变了九边社会。乾隆时期,在新疆大力提倡兴办屯田且规范空前,成效显著,王恩春介绍了当时新疆兵屯、民屯、犯屯、回屯和旗屯等多种屯田形式。^⑩张斯讨论了明代边防重地抚顺的马市贸易,指出马市的繁荣与建州女真的强大密切相关。^⑪

刘永刚考察了在整个清代陕甘地区仓储体系中最为重要、设置也最为普遍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指出陕西社仓不象其他地区,而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经营管理的。^⑫樊莹以地方志资料为依据,分阶段讨论了清代豫北怀庆府的粮食储备状况。^⑬

陈业新将折色作为一种荒政手段,从折色频度、改折比例与力度等方面描述了明代灾害频发的凤阳府折色实施概况,评述改折动机和效果、存在的问题,指出改折的初衷不是出于灾区民生的考虑,而是保证官府税赋的考量,效果因此受到影响。^⑭陈业新在另文中再以凤阳府为对象,讨论了明代国家劝分政策(劝分赏格和劝分手段)及其影响激励下的地方社会捐输助赈行为,认为明后期社会赈恤的积极作用有待商榷。^⑮江太新通过对清代灾荒、经济概况、救灾情况的阐述,探讨经济与救灾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阐明通过这个课题研究所得到的启示。^⑯

熊惠平通过对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中的官民关系的透视,认为乡绅倡率的民间社会救济活动固然不断兴起,但不能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笼罩和社会层级结构固化中的民间社会救济力量,断然不能成为公民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基因”。^⑰丁玲玲利用碑刻和地方文献资料分析了清代泉州郊商在修桥筑路、兴学助教、济贫助困、赈灾救荒等方面的善举。^⑱姚延玲以血缘性的宗族救助、地缘性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为主要内

马俊亚:《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李想:《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陶德臣:《元明茶叶市场管理机构述略》,《广东茶业》2008年第1期。

涂小雨、黄琳雅:《明代农业经济监察制度探析》,《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11期。

刘高勇:《官牙与清代国家对民间契约的干预——以不动产买卖为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张博:《制度调整与清代东北豆货贸易格局的变迁》,《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牛海桢:《试论乾隆以后清朝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政策》,《兰州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宿小妹、李三谋:《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

李三谋、刘彦威:《明代九边军屯与军牧》,《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⑩ 王恩春:《清代乾隆统治时期的新疆屯田》,《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⑪ 张斯:《明代抚顺的边防和马市贸易》,《理论界》2008年第5期。

⑫ 刘永刚:《清代陕甘地区仓储探析》,《文博》2008年第3期。

⑬ 樊莹:《清代河南怀庆府粮食储备状况初探》,《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⑭ 陈业新:《明代凤阳府灾后税粮折色初探》,《中国农史》2008年第2期。

⑮ 陈业新:《明代国家的劝分政策与民间捐输——以凤阳府为对象》,《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⑯ 江太新:《清代救灾与经济变化关系试探——以清代救灾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⑰ 熊惠平:《明清民间社会救济力量生长的困境与趋向探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⑱ 丁玲玲:《清代泉州郊商的善举》,《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容,讨论了明清时期民间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原因、救助的形式及其作用。

张继梅等介绍了明代严密的盐务监督机构网络及其内容广泛的盐政监督活动。陈涛、韩毅以“掠夺之手”模型的视角来分析明代统治者行为对盐商利益以及开中法实施效果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从而得出明代开中法崩溃、盐商“困守支”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制约统治者掠夺之手的制度安排的结论。王日根等运用比较方法,以处于边缘地位的福建盐区和处于核心地位的两淮盐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两盐区分别取法晒盐法、煎盐法背后的体制因素。汪崇策从翔实丰富的史料出发,分阶段考察了康熙至于同治的淮盐江广口岸价,并将其所代表的盐价与米、田价格增长情况进行比较,驳斥了清代盐价“如断线的风筝,扶摇直上”的说法。赵小平讨论了清代云南盐课税以及课率、课额的变动趋势,认为重课率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致使盐价一直居高不下。包国滔关注了学界争论已久的广盐行销江西问题,认为明代广盐行销江西的实现过程,实质上就是市场因素突破食盐专卖体制,迫使明朝统治者作出行政调整的过程。乌江水道是川盐进入贵州、湘西、鄂西及渝东南的重要运道,李良品等考察了清代及民国时期乌江水道盐业管理制度、食盐运输路线及里程、食盐运输工具。徐国洪考察了两广销引、完课最多的广西临全商埠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同治八年长达111年之久的由商人承办的盐业历史,以及李宜民、潘仕成等临全商埠在其中的兴衰沉浮。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大量外省移民迁入自贡,他们为井盐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充足的资金,使自贡盐业迅速恢复并走向兴盛,最终确立“盐都”地位,韩平撰文描述了这一过程。^⑩纪丽真介绍了清代在山东盐区实行的官督商销、民运民销和官运商销等3种食盐运销方式,着重考察了官运商销。^⑪谷晶敏分别考察了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官运民销、官运官销等不同的食盐运销方式,认为盐业政策反映了清政府因时、因地制宜的决策思想,适应了东三省的社会需要。^⑫

货币金融 赵丹将明代白银的货币化首先看作一个文化事件,认为它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现代市民化因素的出现;它还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促进经济全球化。^⑬王丰阐述了明代白银货币化对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⑭陈志鹏将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政府法令“禁银”,而现实中仍然“用银”的时期称为“虚拟银本位时期”,强调此时白银实际上具有的本位地位。^⑮梁言描述了明代宝钞发行过程,认为发行纸币既无规划又前后思想不统一,带来了大量的通货膨胀效应,宝钞破产引起连锁反应,终致财政崩溃。^⑯黄瑞贵介绍了清代广西官铸银锭的铭文特色。^⑰孟妍君介绍了有清一代广西铸币情况,并对雍正朝宝桂局铸币情形做出推测。^⑱明清时期的江南作为全国商业资本最发达的地区,农村典当发展兴盛,常红萍等从江南农村典当的概况、组织管理方式和对江南农村社会的影响三方面对其进行了探析。^⑲

人口 于秋华在收集和梳理国内外大量学术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多维的观察视角,对已有的发现和争议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人地关系、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影响,进而解释了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支持了黄宗智所持的中国在明清时期“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判断。^⑳陈辉将清

姚延玲:《明清时期民间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张继梅、林延清:《试论明代的盐务监督》,《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

陈涛、韩毅:《明代盐商“困守支”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王日根、吕小琴:《析明代两淮盐区未取晒盐法的体制因素》,《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汪崇策:《清代淮盐江广口岸价探讨》,《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赵小平:《略论清代云南盐税及其变化》,《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包国滔:《市场推动下的行政调整——明代广盐行销江西的根本原因》,《江苏商论》2008年第9期。

李良品、吴冬梅:《清代及民国时期乌江水道盐运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徐国洪:《清代广西盐法及临全商埠考略》,《广西金融研究》2008年增刊。

⑩ 韩平:《论清代移民对自贡盐业发展的影响》,《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⑪ 纪丽真:《清代山东食盐运销的主要形式考述》,《理论学刊》2008年第11期。

⑫ 谷晶敏:《清代东三省食盐运销方式浅析》,《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⑬ 赵丹:《重新审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8期。

⑭ 王丰:《浅析白银货币化对明朝社会的影响》,《中国市场》2008年第5期。

⑮ 陈志鹏:《论明代前期的“虚拟银本位”》,《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年第8期。

⑯ 梁言:《试论明代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8期。

⑰ 黄瑞贵:《从铭文探讨清代广西官铸银锭的真伪》,《广西金融研究》2008年增刊。

⑱ 孟妍君、孟国华:《清代广西铸币述略》,《广西金融研究》2008年增刊。

⑲ 常红萍、王亚军:《明清江南农村典当探析》,《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期。

⑳ 于秋华:《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12期。

朝前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概括为由慢及快、从发展迟缓到高速攀升,并讨论了人口增长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徐金秀、虞婷阐述了清朝人口迁移的状况、原因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在清朝前期大量流民流向关外,这些流民对巩固东北边疆,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促进各民族间团结做出了贡献,陈红一文对此作出了描述。罗运胜讨论了明清时期外来移民迁入对湖南沅水中上游人口发展的影响:一方面导致该地区人口大幅度增长,缩小了与全省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则直接造成该地区内部各地人口数量增长的不平衡。

区域经济 章青琴从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城乡市场与商品流通等方面阐述了有清一代云南发展的特点。何伟福、章青琴关注清代云南经济开发与商品经济诸要素,描述了市场的形成、商帮的整合、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早期工业化。杨军指出,清代青海地区民族转运贸易兴盛,并由此导致城市繁荣,但不能因此过高估计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清代青海商品经济发展仍是缓慢、滞后的。他还分别考察了青海东部农业区、蒙藏牧区、城镇等消费主体的消费结构,认为清代青海地区消费水平仍相对落后且存在区域结构差异,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难以出现质的突破。吴超等总结了元明清三代在宁夏平原所采取的加强行政管理、移民、水利建设、重农政策以及畜牧管理等经营方略,指出虽然目的不尽相同,但都促进了宁夏平原的发展。李琳琦等讨论了位于江南边缘的芜湖在明清时期商业、手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阐明了芜湖作为皖江流域经济中心及与江南中心沟通的桥梁地位,并进一步探究以芜湖为中心的皖江流域没能形成像长三角地区那样壮观的经济规模的原因。^⑩石维有等将桂东南定位为粤商入桂的第一站、广东商号的重要延伸地、广州港口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地、广东手工业的主要植入地和粤商文化最重要的承接地。^⑪向福贞分项概括了近百年来国内学者对山东运河区域的研究成果。^⑫魏影讨论了清廷在东北地区先后实行的招垦与封禁两项经济政策,推翻了封禁始于顺治六年、康熙七年、乾隆五年等3种说法,指出在清前中期的东北地区,清廷从未实行过完全意义上的封禁,总是表现出禁中有弛,弛中有禁,弛禁伴随封禁于始终。^⑬王龙涛结合清代乌鲁木齐地区社会背景,利用较为详实的史料描述了在1759—1911年间乌鲁木齐在动荡中逐渐发展、带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城镇经济。^⑭

民族经济 黔东南“糯禾改粳稻”是我国民族经济发展史上外来技术与作物品种推广的典型个案,严奇岩由此个案反思了民族经济发展史上若干误区:量的增长的误区,忽视经济效益原则;技术推广的误区,忽略技术适当原则;经济至上的发展误区,忽略生态效益原则;民族本位的发展误区,忽略文化相对原则。^⑮申莉琴分析了作为陕西回族支柱产业的农业经济在清前期的发展水平及其特点,指出,陕西回族的农耕技术已与当地汉族及其他农业民族的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这些民族。^⑯

对外经济关系 张振介绍了明朝对朝贡贸易和私人海外贸易实行的双轨制管理制度。^⑰冯之余高度评价“隆庆开放”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⑱严小青等将宫廷和民间对香料的旺盛需求,以及朝廷“四海归顺”的政治目的和寻找海外香料,认作促成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并认为郑和出使西洋,促进了中外香料贸易的积极发展。^⑲

陈辉:《鸦片战争前清朝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原因探讨》,《文教资料》2008年5月号下旬刊。

徐金秀、虞婷:《清朝人口迁移对其社会经济的影响》,《管理观察》2008年第23期。

陈红:《试论清朝前期东北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科教文汇》2008年1月上旬刊。

罗运胜:《明清移民对湖南沅水中上游人口发展的影响》,《船山学刊》2008年第4期。

章青琴:《清代云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

何伟福、章青琴:《清代云南经济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杨军:《清代青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与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杨军:《清代青海消费结构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探微》,《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吴超、霍红霞:《元明清开发宁夏平原经营方略比较》,《阴山学刊》2008年第1期。

⑩ 李琳琦、秦璐:《芜湖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⑪ 石维有、韦福安:《清代桂东南在两广经济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⑫ 向福贞:《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学术研究综述》,《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8年第10期。

⑬ 魏影:《清朝前中期东北地区经济政策再论》,《文化学刊》2008年第1期。

⑭ 王龙涛:《清代乌鲁木齐城镇经济初探(1759—1911年)》,《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⑮ 严奇岩:《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史上若干误区的检讨——以清代以来黔东南地区的“糯禾改粳稻”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⑯ 申莉琴:《清代前期陕西回族农业经济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⑰ 张振:《论明朝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年第12期。

⑱ 冯之余:《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社科纵横》2008年第2期。

⑲ 严小青、惠富平:《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

李金明讨论了琉球以朝贡、明朝以册封建立起来的中琉封贡关系,尤其关注其中的贸易成分。曹琳讨论了明代中国商人在和平与友善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把握市场,成功经营海外商业的具体策略。他还阐述了明代华商通过从事中菲国际贸易和菲律宾群岛内的商业贸易,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王建华通过论述闭关政策对国内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作用以及对航海、外贸的影响,来证明闭关政策总体上是保守落后的,是近代中国经济逐渐落伍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想、杨维波则对清代闭关问题予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他们认为虽然清政府在前期实行了禁海、一口通商、公行制度以及对外商来华贸易的种种限制措施,但这并非就是闭关性的政策,而是一种带有封建垄断性的、建立在严格管理基础上的对外开放的“非闭关性”政策,在此政策之下,清前期的海外贸易出现明显增长。自鸣钟在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州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西洋钟中心,它既是西洋钟表传入中国之地,也是西洋钟表贸易基地,是为叶农论文主题之所在。

龚伯勋对2005年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沈村发现的一份有关茶马古道历史的民间合约进行解读,重现边茶贸易的若干细节。

www.cnki.net

李金明:《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曹琳:《明代东南亚华商经营之道探微》,《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明代海外华商经营策略浅析》,《商场现代化》2008年1月(上旬刊)。

曹琳:《明代华商对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影响》,《商业时代》2008年第9期。

王建华:《论清朝闭关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李想、杨维波:《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非闭关性”》,《粤海风》2008年第1期;《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非闭关性”》,《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叶农:《明清时期广州与西洋钟表贸易》,《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龚伯勋:《〈万历合约〉与古长河地方的茶马贸易——解读泸定沈村明代〈万历合约〉》,《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